

# 我国居民对就业与失业问题关注的趋势分析<sup>①</sup>

□ 任莉颖

**摘要:** 就业与失业问题是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我国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感知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度和社会经济稳定的程度。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8-2017年五轮的重复截面数据,采用年龄-时期-世代(APC)方法,分析了过去十年我国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的变化趋势,并从不同的时间维度剖析这种趋势在不同年龄群体、不同世代、不同时期的差异性。本研究结果丰富了对社会问题的主观态度研究,并提出关注青年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就业心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就业、失业问题; 关注趋势; APC分析; 世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 C9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9)06-0122-09

## 引言

就业与失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也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就业与失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业难意味着失业风险高。“失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困难性,进而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生活上的贫困、抵御风险的脆弱性和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sup>[1]</sup>。失业问题容易引发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也会给个人的心理带来压力,如因职场受挫而产生不满、抱怨、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可能会蓄积社会剥离感,对社会、对政府不满,而衍生出集体行动,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对处于劳动力年龄的人来说,即使没有处于失业的状态,他们对就业、失业问题的担忧也普遍存在。因此,关注居民对于就业与失业问题的主观态度一直是民意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把握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形势运转状况的主观晴雨表。

学者们对就业与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理论阐释及经验分析<sup>[1][2][3]</sup>。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当代中国,就业问题一方面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也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科技上的大变革,人工智能给生产、工作、生活带来了便利与高效,同时一些岗位可能会被机器所取代,造成技术性失业的隐患。虽然经济学的“自动吸收理论”认为被新技术排挤的工人会迅速在新的岗位上就业,然而不可避免会有被“挤下车”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短期也会出现高技能工人的供不应求,造成“用工荒”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第二,我国正在经历的一个重大社会变化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21世纪起,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已超过1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已超过7%,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40岁以上的中高年龄劳动者占比在逐年升高。中高年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往往处于劣势,失业风险较高。第三,我国长期劳动人口基数大,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压力一直较大,1999年以来高校扩大招生,大学毕业生人数大幅度增加,非农就业压力加大致使这一代人集体面临就业难问题。

居民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过程是一种社会认知活动,其关注度是居民在所处社会情境下对社会信

**作者简介:** 任莉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建设”项目(16ZDA079)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7-20

<sup>①</sup>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CSS2017)。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培林。此项调查CSS2015-CSS2017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的资助。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息加工后而产生的认知结果。社会信息加工一般分成三个阶段:输入、回忆和判断。输入阶段要依照个体已有的概念或知识对信息片段进行解读和组织,将其储存在记忆中。回忆则是对这种记忆的提取,将各种特征联合在一起形成主观推理,并转换为反应<sup>[4]</sup>。具体到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上,输入阶段是对所处特定历史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收纳和整理,是对问题的认识阶段;记忆阶段是信息的储存过程;判断阶段是依据某些标准,如兴趣、利益、信仰、价值观等对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风险性进行权衡的过程。

因此,除了外在社会发生的各类事件会引致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外,居民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时代烙印也会作用于他们的认知系统而导致其对此问题不同的关注态度。从时间维度来看,这种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共同发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可以分解为三条途径: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态度,可能会受到“特定时点”的社会经济事件的结构影响(时期效应),也可能受到“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所有经历之和”的影响(世代效应),还可能受到居民“所处生命历程中的年龄阶段”的特定需求和感知的影响(年龄效应)。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纵贯数据资源,而且需要能够分离年龄(age)、时期(period)和世代(cohort)效应的分析工具。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2008-2017年五次大规模全国代表性调查的重复截面数据,使用年龄-时期-世代(Age-Period-Cohort, APC)方法,展示近年来我国居民对于就业与失业问题的关注态度的变化趋势,并探究促生居民态度变化的机制。

## 一、研究背景及假设

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社会现象的变迁会受到三个相关因素的共同驱动:第一是年龄,即从出生到接受研究者观察的成长时间,体现了个体生命周期的演变<sup>[5]</sup>;第二是时期,即研究者观察的时间,蕴含着社会情境的变化,会同时影响各年龄群体;第三是世代群体,即出生时间相同或相近的一群人,他们会共同经历社会情境的变化,并且在同一时期进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形成社会的“新陈代谢”<sup>[6]</sup>。因此,在社会变迁研究中,年龄、时期和世代群体是三个最基本的分析机制。

### (一) 年龄效应

居民对就业与失业问题关注的年龄效应可以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理解。我国将16-60岁定义为劳动力年龄,也就是说一个人大约初中毕业时进入劳动力市场,到60岁时退休离开劳动力市场。在这个阶段的成长过程中人们一直承受着就业的压力与失业的风险,然而在不同的年龄段压力和风险的强度不同。2016年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劳动人口中失业风险最高的三类群体是:16-29岁青年农民工、22-24岁大学毕业生和45-60岁中老年劳动者<sup>①</sup>。对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失业率在年龄分布上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U形特征,即年龄较低和年龄较大农民工失业的概率大于中间年龄段的农民工群体<sup>[7][8]</sup>。因此,本研究认为,由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程度的失业风险,这种特征同样会呈现在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居民在就业、失业问题的感知度上,由此形成第一个研究假设:

H1 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在年龄上呈现U形关系,即初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居民和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中高龄居民对于就业、失业问题较为关注,而处于中间年龄的居民对此关注较少。

### (二) 时期效应

时期效应汇聚了各个时期发生的所有事件对于个体的影响。对于就业与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居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全国劳动力市场监测结果,从2013年起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发生双重改变: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用工需求总体上已经比较稳定地超过了求职需求,这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对初级和中级技术人员的用人需求都出现显著下降,市场对劳动力的技术和技能等级要求继续增高<sup>[9]</sup>。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居民对于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度会受到这一现实的影响,考虑主观感知上的

① 《<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发布》,北京青年报 2016-11-4。

滞后性,提出以下假设:

H2 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度会在 2013 年后出现上升趋势。

### (三) 世代效应

世代群体,即出生在相同或相近年代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会受到其成长时代的影响,从而在态度、价值观上存在差异。一般认为,在不同世代出生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社会景观,而每个世代的人群所拥有的社会机会和所受到的社会限制与其他世代群体也是不一样的<sup>[10]</sup>。世代效应一直被学者们所重视。比如有研究发现,出生在物质较为匮乏时期的人往往会比较物质主义,而成长在物质富足的生活条件下的人则更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sup>[11]</sup>。也有学者对 20 世纪中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进行研究,发现“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具有持续性影响<sup>[12]</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无疑会在人们的成长历程中留下印痕,影响到他们对事物或现象的看法。70 年来我国就业政策的变迁<sup>[13]</sup>直接影响到不同世代群体对于就业与失业问题的态度。我国在 1956 年之后到 1978 年一直执行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并具有鲜明的计划性特点。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时期曾经出现充分就业的假象,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失业现象严重,1968 年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量劳动力向农村转移。1976 年之后,大量知识青年返城,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原有的统包统配模式受到挑战。在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下,政府在 1980 年提出“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模式”,劳动力逐渐市场化,转向“双轨制”的多元就业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改革致使大批工人下岗。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职工 1.1 亿人,1998 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则为 5200 万人,而原为 4000 万人的集体企业职工,更是锐减为 1000 多万,这减少的 7000 多万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除一部分直接转到非公有制企业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2002 年起我国实行以对接就业需求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相继制定一系列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政策,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体系,同时逐步建立起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逐步走向成熟。这样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居民成长在计划体制下,经历了知识青年返城的就业压力,而后又和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居民一起经历了从统包统配到双轨制的就业政策的过渡期,因此他们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度会随着出生年份的后推而上升。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居民进入劳动市场时已基本取消了统包统配政策,实行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机制,他们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度会接近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出生的世代群体,且不会再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历史上另一个大的政策变化是 1999 年开始的高校扩大招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教育部发布的数据计算,1999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大约是 90 万,到了 2017 年已猛增到 795 万,年均增速高达 12.9%。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员从 1999 年的 336 万人增长到 2016 年的 1018 万人,年均增速为 6.7%。加上已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换工作再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80 后)和 20 世纪 90 年代(90 后)的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遇到巨大的挑战<sup>[14]</sup>。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80 后和 90 后的就业形势会出现结构性的紧张,高校毕业生因为期望过高而难就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因为学历弱势在劳动力市场上降低了竞争力,增加了失业风险。

本研究认为这些历史事件会影响到不同世代群体对于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态度,综合以上思考,提出如下假设:

H3 在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度上,不同世代存在差异。其中,50、60 年代出生的居民会随着出生年份的后推,关注度上升;70 年代各年份出生居民的关注度会相对稳定;80、90 年代出生的居民相比其他世代对此问题的关注度更高。

此外,一些影响个体认知能力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本文在分析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时,一方面需要排除这些因素的混淆作用,同时也可对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进行解读。这些因素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个体的生理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和性别;第二类是个体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包括户口、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第三类是居民的地域特征。

##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 (一) 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设计并实施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该调查在2005年发起,是双年度的纵贯截面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次调查访问7000到10000余个家庭,其研究结果可适用于全国年满18-69周岁的境内居民<sup>①</sup>。

CSS自2006年首次调查起就设计了一组社会问题,请受访居民选出三项本人认为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就业、失业问题在2008年以后的五次调查中均有提及。因此本研究采用该调查2008年至2017年的五期重复截面数据(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该调查在每年7-9月执行,所以获取的居民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是基于他们对前一年状况的观察或感受。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具体测量的是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重要性和风险性的认定。具体地说,如果就业、失业问题被受访者列为最重大的三个社会问题之一,便认为该问题引起了此居民的关注,选中为1,未选中为0。

解释变量包括年龄、时期、世代,以及其他个体特征或背景变量。年龄变量为调查时受访居民的周岁。时期变量采用的是五轮全国代表性调查的年份,为定类变量,取值为2008年、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世代群体变量是根据受访居民的出生年份每隔5年划分为一组,共计12组。

性别变量为二分变量,1为男性居民,0为女性居民。社会经济结构变量包括户口、教育、工作和家庭收入。家庭收入按照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分为低收入家庭、中间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三组,选取中间收入家庭组为对照组。其他变量均存储为二分变量,包括是否为农村户口、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以及是否有工作。居住地区变量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模型中选取中部地区为对照组。

各时期截面调查中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均值或占比汇总在表1里。数据显示,2008-2017年居民选中就业、失业问题为重要社会问题的比例稳定在四分之一左右。根据出生年份划分的各世代群体的占比清楚地展示了人口结构的“新陈代谢”<sup>②</sup>。

表1 各时期调查变量的分布描述

名称	2008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就业、失业问题	26.0%	24.9%	24.4%	26.2%	25.5%
年龄	41.6	40.3	39.3	41.5	42.0
性别(1=男)	50.1%	50.8%	50.7%	51.1%	51.0%
户口(1=农村)	64.5%	61.5%	70.5%	67.4%	67.5%
教育(1=高等)	6.6%	16.9%	16.5%	18.5%	19.9%
工作(1=有)	73.8%	70.8%	69.6%	68.5%	65.5%
家庭收入:					
低收入家庭	27.7%	25.0%	22.5%	21.4%	20.5%
中间收入家庭	50.0%	50.6%	53.2%	50.1%	52.2%
高收入家庭	22.2%	24.4%	24.3%	28.4%	27.3%
地区:					
东部	40.7%	35.9%	40.4%	41.4%	41.4%
中部	33.4%	36.3%	31.6%	31.7%	31.1%
西部	25.9%	27.8%	28.0%	26.9%	27.6%
世代:					
1945年以前	6.3%	3.1%	0.7%	0.0%	0.0%
1945-1949年	6.7%	5.1%	4.0%	4.0%	2.1%
1950-1954年	9.6%	7.4%	5.4%	6.6%	6.8%
1955-1959年	9.9%	8.9%	7.9%	8.4%	7.3%
1960-1964年	11.2%	8.7%	9.4%	8.8%	9.4%
1965-1969年	13.6%	12.2%	9.2%	11.7%	11.6%
1970-1974年	12.8%	12.8%	12.9%	13.0%	12.4%
1975-1979年	9.3%	10.4%	13.6%	10.5%	10.0%
1980-1984年	8.3%	10.2%	11.1%	9.7%	9.3%
1985-1989年	9.7%	11.4%	10.8%	11.5%	12.1%
1990-1994年	2.5%	9.8%	12.2%	10.6%	10.1%
1995-2000年	0.0%	0.0%	2.9%	5.1%	8.9%
样本量	7,138	6,328	10,205	10,242	10,087

注:表中数值是考虑各年度调查的权重后计算。除年龄为均值外,其他变量为占比

① CSS项目介绍请参见: <http://css.cass.cn>。数据获取自“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平台([csqr.cass.cn](http://csqr.cass.cn))。

② 从表1中还可以发现其他变量的历时变化,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在逐年上升,而有工作的人的占比在逐年下降。但这不在本研究关注范围内,故不做讨论。

(二) 分析方法

在本文的研究假设中,年龄、时期和世代群体是三个核心影响因素。在常规的截面调查研究中,三者是完全的线性关系,即:出生年份=时期-年龄,这致使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无法分解出这三个变量的净效应。

在研究需求的推动下,研究者们对于如何识别年龄、时期和世代群体效应提出了多种策略<sup>[15][16]</sup>,其中 Yang 和 Land 提出的多层次年龄-时期-世代分析-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简称 HAPC-CCREM)适用于本研究的重复截面数据的分析。

HAPC-CCREM 是基于混合模型的原理,在 HAPC 的模型框架下,将年龄作为个体层次的变量,而将时期和世代群体作为群体层次的变量,三个变量分处于两个层次,在同一层次上的分析不存在线性相加的关系,从而避免了无法识别的问题。在此模型中,年龄效应表现为固定效应,而时期和世代效应则为随机效应。

由于本项研究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因此采用广义线性分层混合模型的界定方式。具体如下。

个体层次(层一):

$$\text{logit } Pr(Y_{ijk} = 1) = \beta_{0jk} + \beta_1 AGE_{ijk} + \beta_2 AGE_{ijk}^2 + \beta_3 MALE_{ijk} + \beta_4 RURAL_{ijk} + \beta_5 HIGHEdu_{ijk} + \beta_6 WORK_{ijk} + \beta_7 FINC_{ijk} + \beta_8 REGION_{ijk}$$

群体层次(层二):

$$\beta_{0jk} = \gamma_0 + u_{0j} + v_{0k}, \mu_{0j} \sim N(0, \sigma_u), v_{0k} \sim N(0, \sigma_v)$$

合并模型为:

$$\text{logit } Pr(Y_{ijk} = 1) = \gamma_0 + \beta_1 AGE_{ijk} + \beta_2 AGE_{ijk}^2 + \beta_3 MALE_{ijk} + \beta_4 RURAL_{ijk} + \beta_5 HIGHEdu_{ijk} + \beta_6 WORK_{ijk} + \beta_7 FINC_{ijk} + \beta_8 REGION_{ijk} + u_{0j} + v_{0k}$$

其中: $i = 1, 2, \dots, n_{jk}$ 代表在第  $k$  个调查年(时期)里世代群体为  $j$  的个体; $j = 1, 2, \dots, 5$ 代表第  $j$  个世代群体; $k = 1, 2, \dots, 5$ 代表在第  $k$  个调查年。

年龄为连续变量,用在此模型中采用基于总体平均值的去中心处理。考虑年龄效应假设会出现 U 形特征,因此也将年龄的平方项带入统计模型。本文采用统计软件 SAS9.4 进行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 趋势描述

在进行 APC 分析之前,我们先分析 2008 年以来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情况的总体变化趋势。

图 1 展示了各个时期认为就业、失业问题是三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的居民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从 2008 年到 2013 年,居民对于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比例逐渐下降,2015 年上升,超过 2008 年的比例后,在 2017 年又有所下降。不过整体而言,波动的浮动较小,2015 年最高点时为 26.11%,比 2013 年的 24.33%的最低点高出不足两个百分点,而且统计结果显示各时期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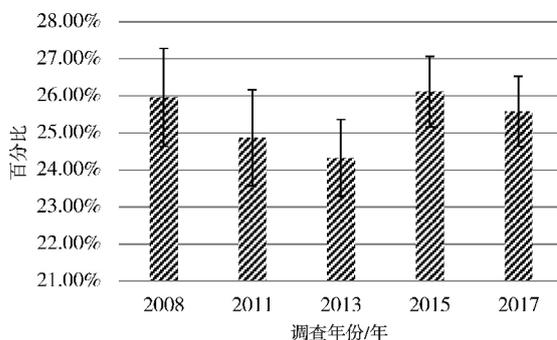


图 1 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趋势描述

这个趋势是年龄、时期和世代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将对三种效应的作用方式进行分解探讨。

(二) 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分析

对就业、失业问题的 HAPC-CCREM 分析结果汇总在表 2 中。表 2 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报告的是模型的固定效应,用于分析个体(第一)层次自变量的影响,其中系数即为常规的逻辑斯蒂回归系数,符号为正的数值表示对因变量具有正向作用,符号为负的数值则表示负向作用。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作用的强度,可以通过对该系数取对数,获得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变化。第二部分报告的是模型的随机效应,反映群体(第二)层次变量,也就是时期和世代的影响作用。最后部分报告了模型的拟合情况。

### 1. 年龄效应

表2的报告结果显示,年龄变量的一次项统计显著,而平方项统计上不显著,意味着年龄效应并非如假设H1中所预期的呈现U形特征,而是单调递减的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于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在逐渐下降。图2中展示出各年龄组把就业、失业问题作为重要社会问题予以关注的概率预测。可以看出该曲线分为三段:第一段从18岁到34岁,预测概率从最高点的36.74%迅速降至25.42%;第二段是35-49岁,这一阶段预测概率保持在25%左右;第三段是50-70岁,预测概率继续下降直至14.96%。

这表明居民对于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具有很强的生命周期特征。人们在30岁以前是选择职业的重要时期,他们除了初次就业,还会频繁地更换工作,寻找最满意的职业和岗位。因此对于劳动力市场接触最多,也最为关注。人在30-50岁工作已基本稳定,而且由于抚养负担,不会轻易更换工作,但会寻找更高的职位,有更好回报的岗位,需要持续关注就业问题。虽然研究发现中高年龄劳动力失业风险高,但50岁及以上年龄的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的概率并不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挤出效应,即人到老年,会将关注点转移到医疗服务或养老保障上,就业、失业问题的相对重要性降低。

我们进一步查看年龄效应内部是否存在分化,选取户口、教育和家庭收入作为分组变量,结果如图3所示。图3a显示各个年龄段,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均比农业户口居民更为关注就业问题,并且统计显著。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活动能消化部分失业农民工,而对于没有耕地的非农业户口居民,就业的压力更大。图3b中,代表受过高等教育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的曲线几乎重合,意味着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在年龄效应上没有显著差别。图3c中来自低收入家庭和中间收入家庭的居民的年龄效应比较接近,而来自高收入的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概率显著降低。三个收入组的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关注概率的差异在缩小,从18-24岁年龄组的8%降至65-70岁年龄组不足4%,呈现收敛趋势。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近或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时,收入与居民是否关注就业、失业问题的关系强度减弱。

### 2. 时期效应

在剥离了年龄和世代效应后,居民是否关注就业、失业问题的时期效应在图4中展示。首先可以看出曲线的趋势走向与前面的总体描述分析结果十分相近,2008年到2013年居民关注的概率从25.18%降至22.09%,2015年升至24.17%,然后又下降到23.77%。

表2 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的

HAPC-CCREM 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P 值
截距	-1.772	0.085	<0.0001
年龄	-0.026	0.003	<0.0001
年龄(平方/100)	0.001	0.013	0.906
性别(1=男)	-0.347	0.026	<0.0001
户口(1=农村)	0.024	0.023	0.293
教育(1=高等)	-0.048	0.035	0.163
工作(1=有)	-0.438	0.027	<0.0001
家庭收入:			
中间收入家庭(参照)			
低收入家庭	0.005	0.029	0.864
高收入家庭	-0.330	0.029	<0.0001
地区:			
中部(参照)			
东部	-0.122	0.027	<0.0001
西部	0.146	0.029	<0.0001
随机效应	系数	标准误	P 值
时期			
2008年	0.042	0.039	0.277
2011年	-0.054	0.038	0.153
2013年	-0.073	0.036	0.039
2015年	0.063	0.036	0.079
2017年	0.022	0.037	0.549
世代			
1945年以前	-0.192	0.112	0.085
1945-1949年	-0.105	0.093	0.258
1950-1954年	-0.055	0.078	0.479
1955-1959年	0.121	0.069	0.078
1960-1964年	0.157	0.065	0.016
1965-1969年	0.279	0.062	<0.0001
1970-1974年	0.086	0.062	0.168
1975-1979年	-0.068	0.063	0.281
1980-1984年	-0.185	0.066	0.005
1985-1989年	-0.081	0.070	0.244
1990-1994年	0.044	0.080	0.583
1995-2000	0.000	0.094	0.999
方差构成	方差	标准误	P 值
时期	0.004	0.003	0.111
世代	0.025	0.013	0.030
模型拟合			
-2 残差对数似然值	203867		P<0.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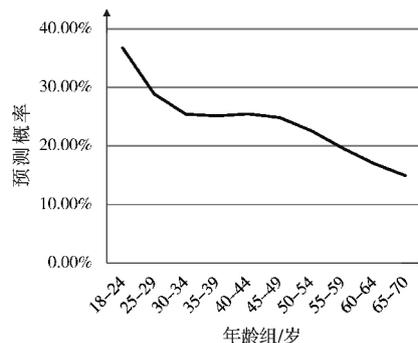


图2 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的年龄效应

表 2 也报告 2013 年的随机效应系数显著低于其他时期 ( $P = 0.039$ )。因此 H2 假设中提出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会在 2013 年后出现上升趋势得到了数据支持。

图 5 显示非农业户口居民在各个时期把就业、失业问题当成重要社会问题予以关注的概率高于农业户口的居民,差距在 6% 左右,并且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印证了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就业压力相对较大的判断。历时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更为关注,且二者的差距在不断加大,从 2008 年的 2.23% 增长至 2017 年的 5.85%,而且统计上从不显著转为显著。时期效应也体现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居民之间。2008 年时,来自中间收入家庭的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居民比较接近,预测概率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的居民,然后低收入家庭居民的

关注概率逐渐下降,在 2013 年和高收入家庭居民仅有 1 个百分点的差异,到 2015 年二者的差异已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相反中间收入家庭的居民对于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比较稳定,预测概率一直保持在 25% 左右。

### 3. 世代效应

表 2 中报告的方差构成显示,世代效应总体而言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世代效应对于解释因变量的变异具有显著作用。仔细查看各世代群体的随机效应,发现出生在 1960-1964 年、1965-1969 年以及 1980-1984 年的居民在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上有显著的差异。这个差异在图 6 中更直观地展现出来。预测概率的折线形态与年龄效应的折线图比较相似,也分为三段,而且分界点明显在 1965-1969 年和 1980-1984 年这两个世代群体。出生在 1950-1970 年间的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概率与出生世代有正相关的关系,即出生得越早,对就业、失业问题就越少关注。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生命周期规律的再现,因为 APC 的分析方法已经将年龄效应剥离,此处反映的是世代群体的特征。70 后们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概率比较稳定,在 25% 左右;80 后和 90 后对于就业、失业问题高度关注,相邻的世代群体间的概率以 5% 的差距增长,1995-2000 年的世代群体的预测概率升至最高点 40.3%。

此发现与世代效应的 H3 假设相吻合,时间维度上呈现出三个阶段:对于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居民,他们所属出生世代越靠后,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度越高,反映出在就业政策转轨过程中不同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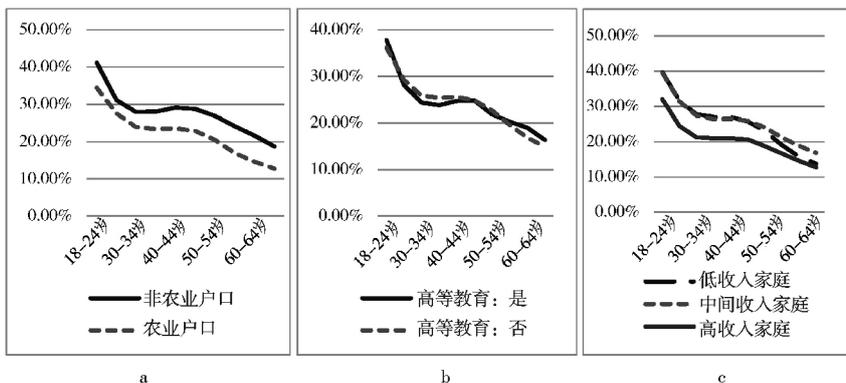


图 3 年龄效应在社会经济背景变量上的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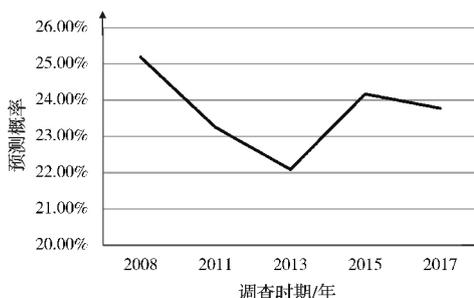


图 4 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的时期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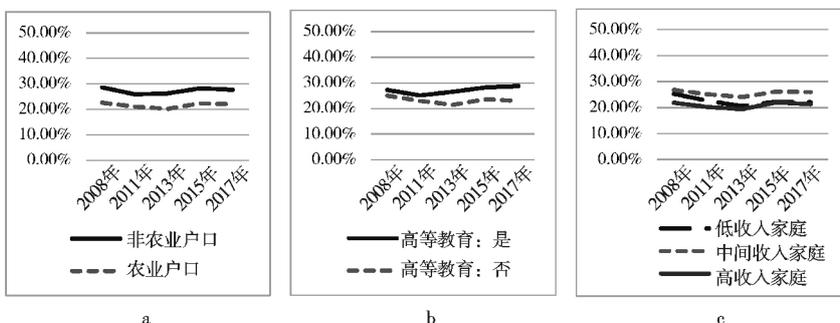


图 5 时期效应在社会经济背景变量上的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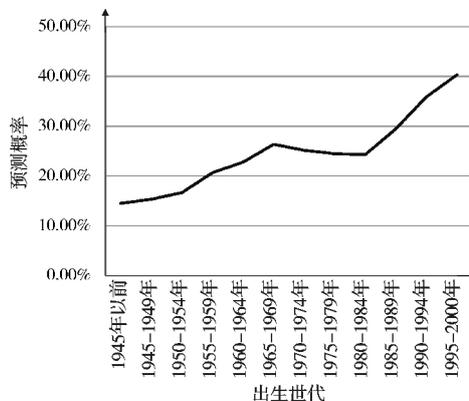


图 6 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的世代效应

居民的逐步适应;70年代出生的居民没有延续这一趋势,而是出现一个平台期,表明就业政策趋稳,他们已经接纳了主动就业的政策,保持对劳动力市场的关注;80后和90后出现了陡然上升的趋势,意味着他们面临着高校扩招,毕业生增加、城市就业困难的压力下,会对就业、失业问题相对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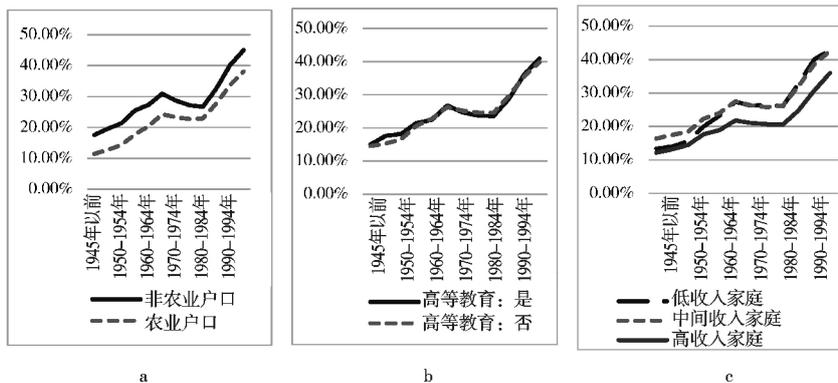


图7 世代效应在社会经济背景变量上的分解

和年龄效应、时期效应一致,对于同一世代的居民,非农

业户口的居民比农业户口的居民更关注就业、失业问题。出生在1955-1959年的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差异最大,预测概率相差7.68%,而在1980-1984年的差异最小,为3.79%。同一世代的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也和我们预期的一致,即高校扩招政策使80后、90后人群的就业压力都增大了。各世代群体中,中间收入家庭的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概率一直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居民,低收入家庭中的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居民对这一问题也保持了较高的关注。

#### 四、总结与讨论

就业、失业情况是考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考察我国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

本文对2008-2017年五次大规模重复截面数据采用多层次APC模型分析,识别年龄、时期和世代对于居民在就业、失业问题关注上的独特效应,拓展了关于居民对社会问题主观态度形成的机制研究。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就业和失业问题的关注具有劳动力生命周期的特征,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可能性在逐渐下降,青年人对就业、失业问题最为关注;世代效应的分析也发现,即使控制住年龄的影响,80后和90后仍是最关注就业、失业问题的群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就我国现阶段来看,无论是出于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还是成长过程中的特别经历,对就业、失业问题最关心的人群是年龄处于18-30岁的80后、90后人群。这个现象一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80后和90后群体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代表着我国的未来,青年人对就业的重视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职场上遇到的挫折归因于社会,甚至采取过激的行为,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政府在注重制定政策促进青年人高质量就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及时把握青年人的就业心态,并进行适时有效的引导。

本研究还发现2008年至2013年,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的可能性逐年下降,而在2015年居民关注的可能性出现大幅度提升,这是2013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在量上和结构上发生双重转变的主观反映,它意味着居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变化具有主观关注度上的敏感性,并且在态度变化的时间上略有延迟。换言之,外在社会现象或政策的改变,对居民的影响并非是即刻的,通过对其后几年的态度变化的考察可以更为准确地分析社会现象或政策的影响结果。在这一点上,采用APC模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外在社会现象变化或政策实施的时期效应。

以上发现都是通过模型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后得出的。反之,在控制了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个体特征,尤其是户口、教育及收入对于居民关注的影响。首先,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比农业户口居民更为关注就业、失业问题,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要高于农村居民。第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和年龄、世代没有交互效应,但在时期上表现出差异,在同一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更可能关注就业、失业问题,而且二者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仍然形势严峻,值得继续关注。第三,同一年龄段、同一出生世代、同一时期的情况下,中间收入家庭的居民与低收入家庭居民关注就业、失业问题的可能性非常接近,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居

民。已有的研究较多关注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这些人往往来自低收入家庭,会有一定的就业困难。然而却较少有研究关注中间收入家庭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后,中间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考量,如果中间收入家庭在为就业、失业问题担心,他们势必会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消费水平,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间收入家庭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需要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们的重视。

总而言之,本研究的发现说明,从年龄、世代和时期三个维度去剖析居民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有助于更加清楚地理解和把握哪些因素在影响居民的主观态度。同时,居民对就业、失业问题关注上的特征,也在不同程度地呼应和验证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原因及特征上的研判。

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已有文献往往侧重于界定、解释问题,以及寻求对策,较少分析居民对社会问题的主观关注。一些舆论分析会总结当年或某个时期的社会热议问题,但这些并非就是我国居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此外,很少有研究分析居民对社会问题关注的趋势变化,对于影响居民关注的因素分析也十分欠缺。因此,本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社会问题的主观态度研究。

#### 参考文献:

- [1]向德平主编《社会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2]朱力《社会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 [3]雷洪《社会问题——社会学的一个中层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 [4]钟毅平、高定国《Wyer的社会认知模式述评》,载《心理科学》1995年第2期。
- [5]Riley, Matilda W.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ge i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 (52): 1 - 14.
- [6]Ryder, Norman B.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5 (30): 843-61.
- [7]温兴祥《失业、失业风险与农民工家庭消费》,载《南开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 [8]杨凡、杜姗姗、陶涛《中国流动人口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载《人口研究》2018年第4期。
- [9]李培林等主编《中国社会形势研究25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 [10]李强、邓建伟、晓箬《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 [11]Inglehart R.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77.
- [12]Zhou X, Hou L.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64): 12-36.
- [13]谢秀军、陈跃《新中国70年就业政策的变迁》,载《改革》2019年第4期。
- [14]岳昌君、周丽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分析:2003—2017年》,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4期。
- [15]菲尔鲍(Firebaugh, G):《分析重复调查数据》,叶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版。
- [16]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New Models, Method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Chapman & Hall/CRC Press, New York, 2013.

## Residents’ Attention to Unemployment Problem: A Trend Analysis

REN Li-y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Un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Residents’ attention to unemployment issue to a great extent can reflect the degree of societal harmoniz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ive waves of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between 2008-2017 and employing age-period-cohort (APC) analytical technique,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trend of residents’ attention to unemployment issue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features of trends among residents at different ages, from different cohorts and at different periods by unpacking the time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enriches social issues study from a subjective perspective and also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o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employment mentality of the youth and the middle-income people.

**Key words:** unemployment issue; attention trend; APC analysis; cohort effects

责任编辑 吴兰丽